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战略的魔咒： 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

牛 军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战略的魔咒： 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

牛 军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牛军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08856-6

I. 战… II. 牛… III. 冷战-美国对外政策-文集
IV. D871.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6785 号

责任编辑 韩梅梅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

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

牛 军 主 编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发 行 中 心 发 行

常 熟 新 骅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6.5 插页 4 字数 340,0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856-6/D·1597

定 价 45.00 元

丛书总序

纵谙古今韬略 横务天下经纶

自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国就不乏“纵横家”，即当代所称的战略家。他们多为君王的策士，胸怀大局，熟谙兵法，满腹经纶，长于韬略，果断决策，机智善辩，纵横捭阖。《战国策》、《孙子兵法》等许多经典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丰富的战略思想。现代中国战略家当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军事思想，至今无出其右者。

西方古代的战略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孙子兵法》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近代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后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鲁士德国政治家俾斯麦的外交战略为后人所仰慕称道。

直到冷战时期，国际战略及该领域的研究，还基本上限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领域，特别是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着眼于结盟与反结盟的外交战略。此前，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设计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框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其实就是一种美国至今仍在执行的试图维护霸权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做这种界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延伸，即区分敌我友，分析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运用国际资源打击主要敌手，维护国家安全。

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命运，国家之间相互隔绝、按照军事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全球化大大丰富了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的外延与内涵。军事战略仍然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传统国

家安全也仍然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但是,随着世界大战阴霾的消散,大国之间大规模战争危险的降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经济竞争加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悬殊扩大了,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离开对上述关乎国计民生的功能性、全球性、跨国界问题的研究,今天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国际战略必须同国家发展战略一起谋划,同步执行。

但是,对具体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取代国际战略研究。应当看到,全球化越向社会纵深发展,国家利益越多元化,内外政策互动越紧密,形成“大战略”的迫切性就越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历来是由其最高决策者来制定的。但是,同过去“伟人时代”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部门在参与国际战略的制定,而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其视角上的局限性。

战略需要综合分析、全局观念、长远谋划、协调执行,也需要深厚的研究基础。对于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来说,我们施展才学的舞台越来越宽阔,但知识面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古今中外的纵向韬略经纶需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全球横向新问题有待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国际战略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其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公开发表或向有关方面提交有政策含义的、面向未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我们鼓励跨学科、多重视角的研究课题,力图实现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本丛书将本着开放、包容、谦虚、严谨的学风,寻觅国际战略领域的精品。尚拜求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惠赐宏论巨制。

王缉思

2008年新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序

长达40多年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展现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画卷。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研究美国冷战时期的大战略，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学术意义和政策含义。

首先是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研究方面的意义。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际战略通常被归纳为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其实，美国这一时期的战略和政策，要比“遏制”一词所体现的含义要复杂深刻得多。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旗帜之下，美国大大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冷战结束时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霸权国家。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包括哪些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内容？在不同阶段，美国对苏联、欧洲、亚洲（特别是中国）、中东、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政策是什么？美国取得冷战的胜利，其战略及政策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又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挫折和教训，付出了什么代价？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思想特色是什么？它如何丰富了美国的外交传统，又留下了哪些思想理论遗产？

其次是世界政治变迁和大国兴衰规律研究方面的意义。美国在同苏联的40多年对抗中最终“不战而胜”，其大战略运用的基本成功只是原因之一，甚至只是次要原因。一个国家的大战略是否成功，决定性因素是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美国的强盛之路，包括在冷战时期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科技、教育、文化的创新进步，以及美国同苏联等国力量对比的起伏变化，是研究美国大战略的应有之义。冷战时期的美苏较量，不仅是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的较量，也是发展模式的较量。美国不仅在经济、军事的硬实力方面，逐渐扩大了同苏联的差距，而且其社会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能力，自我纠错的机制，以及

文化软实力,也越来越领先于对手。换言之,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的根本原因,要从美苏两国国内因素来找,从世界政治和大国兴衰的内在规律来找,而不是从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政策、策略来找。坦诚地说,对于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制度变迁,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还相当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解美国大战略的眼界和深度。

第三方面的研究意义,是考察其他国家在应对美国战略的过程中如何探索国际政治的规律。对外战略和外交从来不是单行道。美国对外战略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根据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政策和态度进行调整。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以美苏对抗和两大国家集团的对峙为主要特征。美苏两国都曾企图利用民族独立运动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打击对方的营垒,因此都对许多新兴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培植自己的势力,给一些国家造成了“亲美派”、“亲苏派”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动荡。美国原想在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撤出的国家“填补真空”,而当发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冲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时,又转而视之为苏联的同盟军,对这些国家加以打击和压制。美国为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而在第三世界进行的活动,其结果往往是激化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反美情绪。在西欧和东亚,许多国家都利用冷战时期的美苏矛盾和冲突,扩大自己的战略缓冲余地,维护了自身安全。中苏分裂、中美缓和之后,中国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国际战略,在“战略大三角”中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于20世纪80年代同美苏两国同时改善关系。法国和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建立了独立的核力量。联邦德国则在70年代初实行“新东方政策”,同民主德国建交,结束了同东欧的隔绝状态。欧共体发展了联合自强的观念,制约了美苏对抗。到了冷战后期,美苏两霸对各自营垒的控制都进一步削弱,而第三世界继续壮大。从这一历史进程来看,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格局只能稳定于一时,其崩溃带有必然性。

第四方面的研究意义,在于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了解。如果我们

把全球化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发现了的历史规律和客观趋势,那么这一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时期就获得了加速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条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扩大。战后初期美国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和机制,推行马歇尔计划,其初衷固然是巩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建立美国经济和政治霸权,但在客观上部分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在40多年的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经历了一些经济危机,但它们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下,启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由此而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大拓展,使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相形见绌,为最终击溃苏联东欧集团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对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战略遏制,阻挠这些国家同外部世界建立经济联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经常对第三世界中有“亲共倾向”的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又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回到研究美国大战略本身,还需要明确“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的含义。美国研究者给美国大战略的界定,一般都包括三个部分:第一,美国在世界上必须维护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s or vital interests)是什么;第二,对这些核心利益的威胁来自何方;第三,用以应对外部威胁的资源、手段和方法是什么。只有明确了大战略,才能产生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等等。¹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对上述问题的答案不尽相同,但都把维护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军事安全列于核心利益的首位,视苏联为美国的主要威胁,把提升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巩固同西欧和日本的同盟关系、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维护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秩序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

本书汇集了中外学者在2007年11月举行的“缔造美国大战略:冷

战的终结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和这批论文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和与会者的发言中,有的从历史的纵向和全球政治的横向宏观把握美国大战略,有的则从经济的侧面、某些国际危机和冲突、美国对一些地区的政策、美国战略家的思想和行为、中美关系等不同角度,剖析美国大战略的策划和实施。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过去的成果比较集中于冷战初期和中期,而本书中一些论文已经对冷战的终结和遗产作出了更多的分析。

我们将在本书发表的论文基础上,对研究成果进行深化和提炼,力争将国内冷战史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并使之服务于中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大战略。

王缉思

2008年11月于北京大学

注释

1. 关于美国学者对大战略的界定及其同政策的关系,参照 Fareed Zakaria, “Wanted: A New Grand Strategy,” *Newsweek*, December 8, 2008. <http://www.newsweek.com/id/171249>;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3.

前 言

美国的大战略与冷战的终结

2007年11月19日到21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缔造美国大战略:冷战的终结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蒙大拿大学、马里兰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20多名著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本论文集就是这次会议的成果之一,在此首先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慷慨帮助,有贵社的慷慨帮助才使读者能够分享与会者的发现与思考。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研究和讨论冷战后期美国的遏制战略与对外政策,特别是它们对冷战终结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以苏联集团崩溃和苏联国家解体的方式突然结束,这一重大事件引起了学术界对冷战设计的一些重大问题的重新思考。十几年来,学术界终于可以利用来自曾经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的多国历史档案,对有关各国的战略和重大决策进行对比分析,一方面重新检验过去的结论,另一方面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一个时期以来兴起的所谓“新冷战史研究”反映了这个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

从上个世纪末期起,学术界对冷战史研究的关注开始转向研究美国的战略和决策,有学者呼吁要“重新将美国带回到冷战史研究”。这部分是因为在比较多地利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档案做了大量的研究后,很多学者认为有必要回过头来利用新的档案和研究成果,重新检视

以往对美国战略与政策以及美国战略与政策得失的评价,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本身也需要根据多边档案进一步澄清。这其实也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召开此次国际研讨会和我们编辑此论文集的一个原因,它可以帮助中国学术界把握有关研究的发展趋势,跟上国际学术研究的步伐。如此将大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另一个原因则比较复杂一些,涉及更广泛的问题。后冷战世界政治的发展与前苏联解体时很多人的预期和预判有不小的差别,美国的世界地位正经历新的变化,美国国内的政治思潮亦有新的发展。此次国际研讨会中中外学者围绕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围绕里根政府的战略的争论,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冷战后、特别是“9·11”以后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等,的确直接影响着学术界对冷战时期、特别是冷战后期美国战略的思考与评价。反过来,对冷战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评价过去影响了、今后也一定还会影响到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认识和思考。从实际情况看,美国的战略制定和战略研究从未停止过对冷战史的研究和关注,可以说美国过去因此成为冷战史研究的最大受益者,今后至少一段时间可能还是如此。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在五个议题上,它们包括:“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研究概述”、“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缘起”、“尼克松政府的战略演变以及遗产”、“冷战期间大国关系的反思”、“冷战的性质和里根战略的分析”。会议期间的发言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不过围绕这五个问题提交的论文和讨论发言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历史顺序,也是这本论文集的基本框架。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论文的内容和它们相互之间的联接,有必要概要地介绍会议讨论的一些重点内容。

一、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研究的概述

这部分讨论的主要内容反映在两位著名的美国学者耶鲁大学的约

翰·盖迪斯(John Gaddis)教授和弗吉尼亚大学的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教授的基调演讲中。约翰·盖迪斯教授在他提交的论文中回溯了冷战时期的重要事件(冷战的起源、朝鲜战争、赫鲁晓夫改革等),比较多地强调了美国遏制战略的性质以及它与前苏联的大战略之间的相互影响。梅尔文·莱弗勒教授的论述则指出,有必要界定清楚从冷战向后冷战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所谓大战略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盖迪斯教授是美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时隔20多年后他又来到北大参加学术研讨会。他在发言中系统回顾了近年来他在这一领域的主要学术观点,认为必须探索国际冲突背后的结构性特征,特别是苏联领导人错误判断国际形势导致苏联在大战略方面存在的严重失误。如勃列日涅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采取进攻性的“世界革命”战略,而戈尔巴乔夫也误判了苏联自身的结构,即前苏联在没有转变为多元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放弃旧的意识形态和势力范围,结果必然导致国家解体。在冷战的起源问题上,盖迪斯教授认为,斯大林个人的观念或者说战略意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是当时唯一具有时间、经验和无可挑战的权威以制定长期的未来计划的领导人。在盖迪斯看来,斯大林不仅具有制定大战略的条件,而且拥有相应的政策理念和目标,如继续推进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他把传统的沙俄帝国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保证边疆的安全;等待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盖迪斯因此认为,斯大林预期了“冷战”的出现,并发展了推行冷战的大战略。而在1945年以前,西方并没有任何针对苏联的类似战略。盖迪斯特别总结了大战略研究对理解冷战和平结束的意义。

梅尔文·莱弗勒教授的观点是鲜明和有针对性的,他认为里根总统并没有一个赢得冷战的大战略,相反,里根当局的政策充满了矛盾。莱弗勒认为,把里根解读为有计划结束冷战的战略家是一种误读。里根虽然相信和平只有通过实力获得,但同时又主张进行自由的圣战。

前者意味着为了谈判建设自己的实力,后者则意味着摧毁共产主义。有关里根政府大战略的神话夸大了军事力量、单边行动、促进民主和道德清晰的重要性。莱弗勒教授指出,在如何理解冷战结束方面,有很多因素都比里根的政策重要得多。

莱弗勒教授指出,美国在冷战期间有过许多的大战略。其中之一是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到1941年间提出来的,包括重建和维持欧亚大陆的均势,保持西半球和海上航线的安全。另外一种大战略则着眼于促进民主资本主义的稳定、持久、公正和适应人们的需要,这是针对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问题的。总之,美国在冷战期间的两个大战略就是维持和扩大开放的市场、保持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这两种大战略的起源都远远早于里根政府时期。莱弗勒教授总结说,生活的经验是理解冷战结束的关键因素,20世纪国际关系中最成功的大战略是构建和整合满足人民需要的国内体系,而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安全、食品、医疗保障、教育机会、社会流动、宗教自由以及享受那些使他们感到生活有意义的习俗。

二、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缘起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小明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张曙光教授、南开大学的赵学功教授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乔恩·苏米达(Jon Sumida)教授在这一主题的讨论中分别探讨了美国遏制战略起源、发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的影响等等。

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冷战时期是美国遏制战略的首倡者和设计师之一。任何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都必然要研究凯南的思想和影响。张小明教授阐述了乔治·凯南与冷战初期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起源。他认为,虽然凯南并不重视东亚地区,但是他却在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制定东亚政策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这集中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与对日政策的调整与制定上。不仅如此,凯南这个时

期对中国与日本地位的认识与判断,对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张小明教授认为,可以肯定,凯南在1947—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美国对日政策方面,凯南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凯南之所以会主张美国选择日本成为主要的盟友,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在东亚日本是唯一重要的国家。

张曙光教授着重讨论了1949年到1953年美国有关国际经济制裁的战略思想。与一般对于冷战初期东亚地区处于“热战”的模糊印象不同,他在讨论中试图证明,经济战略在冷战初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虽然战略问题通常围绕着军事力量的效用,但也越来越多地涉及使用经济手段,“如何运用经济制裁来达到对外政策目标是美国在冷战期间战略思考和决策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具体到美国在1949—1953年的对华禁运战略,他认为美国最初存在着通过经济手段来制裁或者援助中国的两种选择,但援助中国的意见不久就消亡了。至于经济制裁的效用,美国政府内部一直存在争论。张曙光教授的结论是,相比较于军事干涉,经济上的诱惑和制裁是更好的选择;即使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经济武器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赵学功教授重点分析了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美苏关系。他认为,在这次危机中,美苏两国进行了第一次直接的核对抗。危机的过程表明,施加压力要适度,将军事行动局限于清晰地显示自己的决心,并且适合己方有限的危机管理目标;避免采取使对手以为己方将要诉诸大规模战争的军事行动,因为这样会迫使对方考虑先发制人;选择那些示意希望谈判而非谋求军事解决的军事方案。赵学功教授还讨论了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战略决策的后果,认为美苏各自的决策都对自身的联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因为它们都没有与盟国进行充分和很好的沟通。基于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形成的认识,美苏逐步调整了它在冷战初期的战略,美国在看到了核对抗的危险性后,放弃了大规模报复战略。

约翰·苏米达教授探讨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内涵及其对冷战

时期美国战略的影响。他认为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作为战争的一种形式,防御比进攻更有优势。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于克氏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原则、克氏三位一体(情感、理性和偶然性)等诸多重要方面的论述,做出了和美国以前的教科书不同的解读。苏米达教授指出,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看法仍然是正确的,只是原来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在冷战期间,阿尔及利亚、越南和阿富汗等国家内部的冲突证明,那些有意愿承担重大损失的起义部队有能力重挫那些强大得多的敌人,足以迫使进攻国家的政府修改政治目标,放弃进攻性的政策。他认为,克劳塞维茨对防御对进攻的相对优势的认识,可以得到历史的证明,并且还会被当前在伊拉克的冲突所证明。

三、尼克松政府的战略演变及其遗产

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导致了冷战时期美国战略一次巨大的转变,而且由于美国的世界地位,美国战略的历史性转变导致了冷战出现一次历史性的“转型”,对尼克松政府的战略与政策政变设计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从来都是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研究的重点。在这部分的讨论中,华东师范大学的戴超武教授、北京大学的牛军教授、康奈尔大学的陈兼教授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文安立教授(Odd Westad)以及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马克·劳伦斯(Mark Lawrence)副教授等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戴超武教授主要探讨了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和美国对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政策。他认为,在尼克松—基辛格的构想中,核心是“缓和”战略。尼克松政府处理国际经济问题的基础是贸易自由、旅行自由、投资自由以及技术交流自由。正是在这种贸易“自由化”政策和战略的指导下,尼克松政府不仅全面推进和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同中国贸易,并且从商品物资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扩展到战略性

技术领域的贸易自由化,放松了对“巴统”战略性敏感技术严格出口限制的政策。

牛军教授讨论了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他认为,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几乎涉及了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各个主要方面,其中尼克松政府在亚洲的政策调整最具里程碑意义。他着重讨论了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与结束印度支那干涉政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构要想成为现实并有长期的影响,必须能解决紧迫的地缘政治问题,否则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他还特别提到了偶然性因素在尼克松东亚政策转变过程中的意义,认为:“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得以实现,是有运气的成分的”,“所谓的‘运气’其实表明的是,在大国之间既存在数不清的矛盾,也有数不清的机会。”

陈兼教授重点分析了1969—1973年美国对中国和东亚政策变化的影响。他认为,由于华盛顿和北京的和解,美国的冷战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陈兼教授指出,虽然从逻辑上来说,冷战的重点应该在欧洲,而美国的首要敌人是莫斯科,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美国却陷入了东亚军事干涉的泥潭。这也剥夺了美国作为唯一没有殖民主义历史负担的西方国家的形象,使得美国站在了历史进步的反面。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中美和解战略是要达到一种新的均势。陈兼教授认为,中美和解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两国本身,它赋予了冷战新的内涵,使华盛顿可以对它的全球战略做基本的调整;深刻地分裂了美国的冷战对手。这一调整为冷战的终结创造了条件,对当前的东亚地区和世界也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他最后指出:(最重要的教训在于)“正是由于华盛顿认识到了它的实力和影响力的局限性,以及基于对多极化趋势的理解所做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使得美国能够重新界定它的全球战略,从而获得了在冷战中的‘胜利’。”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文安立教授在陈兼教授发言的基础上,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转变做了深入的分析。陈兼

教授比较强调国际体系以美国为中心,文安立教授则强调中国政策变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在探讨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时,必须要重视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也就是从革命国家、阶级斗争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注重经济增长的转变;也必须要注意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也就是从国际关系中的异类转变为正常国家,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除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美国和中国对苏联威胁的共同认知,尤其是越南战争,使得中美双方在20世纪70年代的关系达到了最紧密的阶段。文安立教授的结论是:这一时期的情况表明,中国认识到在一个美国占有霸权地位的国际体系中,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发展经济交流等,对中国是最有利的。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劳伦斯副教授探讨了这一时期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劳伦斯副教授的分析是批判性的,他认为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看不起拉丁美洲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此他们的目的仅仅是维持这一地区的基本稳定,以避免干扰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战略。劳伦斯副教授指出,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转变是从林登·约翰逊时期开始的。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该地区不稳定性的增长和美国控制能力的下降,尼克松政府认为遏制西半球激进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培植当地的右翼势力,包括军事政权。劳伦斯副教授指出,尼克松政府的这一决定既是根源于尼克松个人对第三世界是否可以实行民主的怀疑,也是由于他热切希望减轻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负担。他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处理拉丁美洲问题的这种做法忽视了人权,必然遭到拉丁美洲人民和美国老百姓的反对无法继续下去。

四、冷战期间大国关系的反思

在有关这个主题的讨论中,各国学者探讨了冷战期间的中美关系、美法关系和美日关系等等,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在中美关